
現階段的兩個德國問題

蘇秀法

從赫爾斯坦主義到東向政策

一九四九年德國正式分裂後，東、西德雙方最初都維持「德國統一」的主張，不同的是：西德追求的是西方民主式的德國，而東德追求的則是共產體制模式的德國。因為這兩個目標互相排斥，而蘇俄和東德也都了解，要想德國統一而又達到共產化的目的，決難在短期內實現，所以，自一九五五年七月日內瓦會議開始，就公開主張「兩個德國」的理論。但是西德仍舊繼續維持德國統一，以及只有西德政府才能代表全德人民的政策。

東德政府於一九四九年成立後，僅能獲得蘇俄和少數共產國家的承認。這是一方面由於東、西雙方的冷戰，同時也是由於艾德諾政府堅決反對他國承認東德的政策。在赫爾斯坦原則下，西德政府主張只有西德政府是全德國人民的代表，任何第三國對東德的承認，都是對西德的不友好行爲，西德即和該國斷絕外交關係。這項以當時西德外交部政務次長赫爾斯坦命名的外交政策，經艾德諾政府核定爲西德外交運用的最高準則，一九五五年九月廿三日由西德政府正式公佈，但西德和蘇俄建交，則係赫爾斯坦主義實際運用的唯一例外。艾德諾政府認爲蘇俄是德國問題交涉和談判的對象，如無外交關係，則一切交涉談判都無法進行。西德總理艾德諾一九五五年九月訪問蘇俄，並和蘇俄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於是，兩個德國都在莫斯科有常駐外交代表。當年艾德諾的這項妥協一是基於人道考慮：西德政府藉此方能獲得蘇俄同意釋放德國戰俘；二是基於政治考慮：蘇俄爲戰後四個對德佔領國之一，欲求順利解決德國問題，西德和蘇俄建立外交關係，自有必要，而西德政府恐別國援用東、西德在莫斯科派有雙重代表的先例，承認東德，所以發表赫爾斯坦主義，說明西德政府的立場。其用意顯在孤立東德政權，貶低東德的國際地位。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和東德建交的祇有十五國，和西德建交的多達九十九國，赫爾斯坦主義確曾發生很大作用，有效地遏阻了國際上兩

個德國的姑息論調。

西德執行赫爾斯坦主義曾有兩個具體實例：一九五七年南斯拉夫和東德建交，西德立即與之斷絕外交關係；一九六三年古巴和東德建交，西德也斷絕對古巴的外交關係，西德赫爾斯坦主義最大的憑藉，是戰後經濟迅速復興，社會繁榮安定，能夠利用其雄厚的經濟潛力，對外援助。如果一國想和東德建交，西德即以斷絕經援為報復手段，那些想和東德建交的國家，為了自身利益考慮，自不得不停止這項「冒險」。同時，艾德諾能夠堅持原則，也是一項不容忽視的因素。

赫爾斯坦主義會成功地阻止他國和東德建立外交關係，却無法阻止他國和東德建立領事商務等關係：東德自一九五九年起，即在開羅設有總領事館，也分別在塞浦路斯、芬蘭、智利、墨西哥和烏拉圭成立貿易代表團，同時又和巴西、哥倫比亞等國簽訂貿易協定。不過，赫爾斯坦主義同時也束縛了西德政府的行動，自一九六三年開始，西德也祇能在東歐共產國家設立貿易代表團，却不能和這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到了西德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物布蘭德執政，認識到赫爾斯坦主義既不能造成東德內部的混亂，也不能改變中歐的現狀，進而幫助德國統一目標的實現，所以自一九六九年秋天開始，布蘭德就積極進行「東向政策」，致力於改善和東歐國家的關係。

在實行東向政策的過程中，西德政府先後和蘇俄、波蘭、捷克締結友好條約，又和美、英、法、俄四國簽訂有關柏林條約。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一日，東、西德雙方進一步締結基本條約。條約主要內容為：規定東、西德兩國之任何一方不能在國際間代表他方或以他方之名義行事，雙方承認彼此之自主獨立，在東柏林與波昂互設常駐代表團，自是兩個德國關係急轉直下，由於西德政府外交政策的轉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才開始承認東德。東、西德政府現已和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

東、西德對雙方簽訂的基本條約各有不同解釋。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一日，西德聯邦憲法法院確定基本條約並不違反西德基本法，也不違反基本法中規定的「國家再統一」的條款。因為基本條約並未對東德作國際法上的承認，東德不是外國，東、西德之間之邊界並非國界，東德居民只要進入西德，即為西德國民。基於這種認識，西德派往東德的常任代表並非由西德外交部，而是由西德聯邦德國事務部直接管轄。同樣的，東德派往西德的常任代表不能與西德外交部而只能與西德聯邦德國事務部交涉談判。

東德則認為東德對西德關係只是東德對外關係的一部份，東德駐西德的外交代表是由東德外交部派遣，而西德派駐東德的外交代表的接觸對象，也只是東德外交部。一九七四年十月東德修改憲法，改變東德對「德意志民族」的態度。東德一九六八年的憲法說東德是「一個德意志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一九七四年的憲法却說東德是「一個工農民的社會主義國家」。一九六八年的憲法尚主張德國統一，一九七四年的憲法已完全刪除「德國統一」的字句。

民族認同問題

現階段的兩個德國問題

東、西德分裂的事實，已經持續了二十五年，而短期內也難以看到統一的可能，但處身前線國家地位的兩個德國，對所謂民族認同問題，經常舉行討論，以求在心理上達到政治穩定的目的。歷史證明，德意志民族對於認同意識的要求，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西德政論家羅文泰教授 (Prof. Richard Löwenthal) 曾對戰後西德社會有關德意志民族認同問題做過解釋性的結論說：「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自實施基本法三十年以來，以任何客觀的標準橫量，都算是西歐最穩定的國家，但是西德人民却無法相信這個事實。任何短暫離開西德社會的德國人，當他重新再回到西德時，立即覺觸到客觀的穩定和主觀的不安全感，根本無法調和。就個體言，西德人民對當前的處境多能表示滿意，但作為一個政治羣體來講，却對未來的憂患，感到深深不安」。

在艾德諾執政時代，西德人民與韋伯 (Max Weber) 式的清教徒社會認同，東德則機械式的抄襲史達林模式，並且與之認同。西德社民黨和自民黨聯合執政期間，適逢西德社會發生鉅變，西德制服恐怖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挑戰之後，在民主政權合法性的論戰中，獲得肯定，但是西德社會中的認同意識却逐漸開始鬆弛。當時執政兩黨的聯合政府，以不涉及認同意識的政治心態，作為一種爭取認同的方式。但東德從烏布希特 (Walter Ulbricht) 到何內克 (Erich Honecker) 都以加強灌輸認同意識為首要的政治任務，並進而開始鼓吹一種新的認同意識，不但與西德的認同意識毫無共通之處，甚至可以說和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文化脈流背道而馳。

東、西德自一九四九年成立政府時起，即分別隸屬於以美、俄為首的兩個國際對立集團。美、蘇的和解或衝突，都自然而然地影響到兩個德國現有的以及未來的關係發展，但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東德在這種情況下，竟首先討論所謂「德意志民族的認同問題」。

在東、西德未簽訂基本條約以前，東、西德人民間的接觸幾近於零。東德政權曾經利用這種絕對隔離的狀態，開始塑造一個新的觀念，即所謂「東德人」的觀念。

今日東德領土大部份是昔日的普魯士和薩克遜地區，但東德政權抹殺這些歷史的淵源和文化的傳統，把東德人民認同意識基礎與東德政權合法性緊密湊接一致。由於東德社會中的工、農業的生產結構方式、所得的分配、消費的取向完全操縱於東德共黨政權，由此祇能允許一種武斷的認同意識存在。

一九七三年，西德聯邦憲法法庭曾作宣判，認為東德人民仍是西德基本法中所指的德意志人民，因此所謂「東德國籍」的問題，根本不能成立。東德政權製造所謂「東德人」觀念所隱含的政治動機，遭受到西德的排斥。

一九八〇年代，東德處置一些不願認同「東德人」意識的不滿份子，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他們流放西德。東德的報紙和新聞媒體稱呼東德人民為「東德國民」，稱呼西德人民則為「西德人」，至於稱呼所謂「德意志人」，祇是用在東德對西德的宣傳

文件和廣播上。

東德政權一方面要利用「德意志人」的血緣上認同基礎，實現把西德孤立於其他西歐社會以外的政治目標；同時在內政上又儘量傳播「東德人」的存在，根本不提及「德意志民族認同」這回事。

西德的認同危機何以日益嚴重？其理由之一是西德議會中的政黨失去政治意識導向的作用，西德人民所追求的意識和議會政黨的運作，缺乏合理的對話。分工細密的工業社會和認同危機，並非有必然的因果關聯，但如忽略工業社會價值觀念，就會加深認同危機。西德綠黨（Green Party）能以「羣衆民主」、「基層民主」的宣傳，作為瓦解工業社會的號召，並在一九八三年三月大選中，獲得進入聯邦議會，但對紓解西德社會的認同危機，毫無助益。

西德的和平運動在東德政權倡導「德意志民族認同」的助瀾下，可以解釋是追求政治心理認同的一個過程。

所謂「德意志意識型態」，在歷史上往往與歐洲局勢或整個世界的災難，關連在一起。如果「德意志意識型態」是指德意志民族自行決定本身命運的話，在目前情況下，東德是不會贊成的，但為配合實際的政治目標，東德才把宣揚德意志民族認同，作為一項武器運用。

西德議會中的政黨，都以「德意志民族認同」為內政上不可放棄的希望，把西德週期性復發的認同問題，局限於西德境內，到底是一個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

德意志民族的認同問題，已與波昂的現實政治脫節，但對於西歐的整體安定來說，未嘗不具有若干正面的影響。

對柯爾政府的疑懼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初，基民黨、基社黨、自民黨接替實行東向政策並且執政達十三年之久的社民黨，組成聯合政府。在總理柯爾在聯邦議會發表政策演說的第二天，東柏林德共機關報「新德意志報」刊載一篇評論，充分顯示西德保守黨派政府的當權，使東德當局感到震撼。

這篇評論是以「新德意志報」駐波昂記者奧托（Werner Otto）名義發表，但顯然出於東柏林高階層的授意。

西德方面認為，「新德意志報」發表類似不當評論，由來有自，並不足怪，該報提到「柯爾需要大西洋甚於歐洲」，但抹煞柯爾所說：「西德正在尋求歐洲統一的新路線」。該報引述柯爾：「和美國聯盟是德國立國政策的基礎」的談話，但波昂解釋柯爾說的聯盟是指北大西洋聯盟，而非單指美國。

「新德意志報」指出，柯爾不提「兩個德國」，而僅用「完整的德國」詞句，別有用心。西德方面解釋柯爾曾說，「德國國

家間」的合作，必須改進。所謂「完整的德國」一詞，僅用於回溯二次大戰後，涉及和盟國權力有關的一些事項，而現在駐東德的蘇俄軍隊，仍然自稱是「駐在德國的軍團」。

西德認為，「新德意志報」報導柯爾談到的德國一九三七年邊界問題，並非出於善意，「新德意志報」說：「對渴望在自己國土上裝置挑釁性的潘興二號和巡弋飛彈已受到大多數德國人反對的柯爾政府，又在追求所謂泛德意志的目標，顯然懷有野心」。

「新德意志報」認為柯爾違反基本條約及其補述的規定，「隨意」談到德國統一問題，以及「現在尚未解決的一些德國問題」。西德却認為基本條約（包括補述）曾載明，德國國家間的問題歧見依然存在，公民權問題也懸而未決，又曾載明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目標在「致力於歐洲和平的增進，以促使德國人能夠在自由的決定下，重歸統一」。

東德共黨書記何內克曾說，當社會主義輕敵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門時，西德所說的德國再統一問題，必將全部重寫。「新德意志報」對柯爾演說的評論發表後，何內克曾試圖緩和東德感到震撼後的氣氛。何內克當時適在塞浦路斯訪問，在記者會上答覆詢問時說，今天如對柯爾演說立即發表完整說明，尚嫌太早，全文的內容必須先加研究了解。這是暗示「新德意志報」評論是一篇匆促發表尚未成熟的意見，然而，何內克畢竟也被該報引述「與美國聯盟作為德國立國政策基礎」的字句困惑不已，一時摸不清楚柯爾的「德國立國政策」的含意，究竟何指。

何內克特別強調，柯德總理只能代表西德談話，但目前却有兩個具有主權和獨立的德國存在。

東德領導階層難以相信波昂新政府，「祇希望把前任施密特政府擱置的有關德意志政策」，繼續擱置下去的說法。

東柏林懷疑柯爾政策講演中的「連續性」一詞，因為他們感覺到柯爾政府勢將在東、西德雙方開始談判時，會採取強硬態度，並將堅持東德減少西德前往東德觀光、探親、訪友者的強迫兌換金額的立場。

東德在西德基民黨、基社黨、自民黨聯合政府組成之初，曾採取疑懼的觀望態度，同時重申何內克一九八〇年十月在格拉（Gera）地方演說時，對西德的四點要求：（一）西德應承認東德人民的公民權，（二）提升兩國常駐代表團至大使館級的地位，（三）解決易北河水域中線為東、西德邊界案，（四）撤銷調查因國家分裂產生之邊境犯罪問題的薩爾斯——紀特爾（Sals-Gitter）辦事處。

十億馬克貸款

時間證明，東德對柯爾政府的疑懼是多餘的，柯爾政府不僅繼續推行社民黨政府的東向政策，而且在各方面更有強化的趨勢。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三日，東德共黨頭目何內克主持萊比錫（Leipzig）春季商展時，曾在西德參展商的招待會中，接受西德

兩家電視臺的聯合訪問，當時何內克說明他個人對兩個德國關係的三點看法：

(一) 普遍改善兩個德國間的關係，有助於緩和因美俄限武談判而陷入僵持局面的世界緊張形勢，中部歐洲區域和平將為整個歐洲安全的首要條件。

(二) 基於東、西德國日益密切的經濟關係，進一步加強雙方的一般關係，最好是從針對雙方互利而又不涉及難以解決的問題入手。

(三) 接受西德保守的基民黨政府總理柯爾邀請，年內訪問西德。

何內克談話中所稱「不涉及難以解決的問題」，兩個德國間各有不同的解釋。西德認為是東德暫時不會再要求柯爾政府以「國際法上承認」，杯葛談判的「東德人民國籍」的難題；而東德却認為是，西德不會再向何內克提出降低西德人民前往東德旅遊、探親的義務兌換金額問題（目前每人每月兌換為二十五馬克），東德認為這是目前不可能對西德讓步的。

由蘇俄駐東德大使阿布拉西莫夫（P. A. Abrasimov）調職的事件，顯示出何內克在東德共黨內部，特別在華沙公約集團之內，地位日益穩固。阿氏駐節東柏林長達十五年之久，也是把何內克提升，替代前東德共黨頭子烏布希特的策劃人。由於阿氏在東德共黨政治局內培養親信，打擊何內克的領導威望，引起何內克的強烈不滿。何內克一九八三年訪問莫斯科時，曾向克里姆林宮表示阿氏的辦事方式，「仍有史達林主義的傾向」。阿氏的調走，提供兩個德國間關係一個新的改善機會。

從一九六三到一九七七年的十四年間，西德曾平均以每名六萬六千馬克的代價，向東德贖換一萬五千名政治犯，支出總數約十億馬克。到了一九八三年，西德又以最優惠條件，予東德十億馬克的貸款。

六月間基督教社會黨的機關報「慕尼黑水星日報」（*Müchner Merkur*）刊出一段語意模糊的新聞說，基社黨正在設計一個和該黨歷來堅持的某些原則大相牴觸的計劃。

到七月初，所謂基社黨的計劃，竟是經由其黨魁史特勞斯（Strauss）的安排，柯爾政府同意給予東德十億馬克巨額貸款的事。同時史特勞斯在八月初前往羅馬尼亞、捷克、波蘭、東德等地作十天的旅行「渡假」，他和東德共黨頭目何內克在東柏林附近 Wehbellinsee 湖畔午餐會談的時間，事先也安排妥當。當然，貸款案和史特勞斯之訪問東德及其他東歐國家的事，如果沒有莫斯科的事先默許，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基社黨內部對這筆巨額貸款案經由史特勞斯居間一事，感到驚訝，反應激烈，聯邦國會議員基社黨人韓德萊斯（Handes）立即宣佈退出基社黨以示抗議，基社黨地方黨部也紛作表示，要在當時即將召開的基社黨代表大會上，對史特勞斯提出嚴厲質詢。

史特勞斯為應付黨內這種動盪情勢，在記者會中表示，他不願再做一個「東、西關係的破壞者」，但並沒有放棄他過去的立

場，祇是在處事方法上改具一些彈性而已。

一九八三年三月間，東德經由中間人向史特勞斯表示，爲了紓解外匯存底的枯竭，東德迫切需要一筆貸款，史氏立即把東德的意向轉告柯爾，當即獲得肯定答覆。柯爾指示這筆貸款，必須以巴伐利亞邦銀行爲首，組織銀行團處理；至於貸款的風險，則由聯邦政府承擔。東德每年對來自西德和西柏林之間徵收的過路費和過境簽證費，數目可觀，東德政府運用這筆款項可做對貸款風險的保證，這些手續都由一家中立的瑞士銀行做過逐點查證。

貸款第一個反應是東德對西德人民出入東德邊境檢查放鬆。根據巴伐利亞邦邊境警察的報告，自是年六月間起，已有顯著的改善，而且這種改善並不是個別事件，而是東德一種新的友好姿態，當然是貸款案帶來的政策性決定。同時，東、西柏林間的出入境手續，也有簡化跡象。

但是倫敦「經濟學人」週刊認爲，東德撤除德國邊境的警戒措施，僅是改換現代化武器的一種手法，實際情形依舊，西德的欣慰僅是一種自我陶醉。

傳統上，西德保守黨傾向於地方分權的發展，各邦派系的勢力超過聯邦的影響力。社民黨稱基民黨爲「選舉時集合，執政時解散的政黨」，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例如西德第二任總理歐哈德(Ludwig Erhard)雖然領導基民黨和基社黨，贏得大選，却對協調各邦派系歧見無能爲力，最後不得不憤而辭職。柯爾曾經不止一次地提到這段歷史，同時又處處讚揚艾德諾，因爲艾德諾會成功地收斂地方派系的囂張作風，柯爾儼然是以效法艾德諾自許。

東德當局知道潛伏在基民黨、基社黨內部的隱痛，所以貸款案不先和西德政府談判，而暗示史特勞斯出面，即是基於減少地方勢力阻礙的考慮。有關貸款談判過程，西德駐東德的代表被摒出門外，史特勞斯等於是沒有外交部長名義的外交部長，或在扮演尼克森時代季辛吉的角色。史特勞斯是對東德和華沙公約集團從來不假以辭色的頑強派，而東歐各國也視史特勞斯是冷戰中的第一號敵人，在這種情勢之下，東德竟能夠說服史特勞斯，而史特勞斯又願使出全身解數爲東德奔走請命，其原因何在？這可以說是與蘇俄希望目前藉由兩個德國間關係來緩和歐洲局勢緊張的政策有關，因爲這筆貸款案正發生在拖延三十個月的馬德里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東、西方獲得妥協之後，兩者之間似有巧合。柯爾政府如能突破施密特時代遺留下來的兩個德國問題瓶頸，來幫助雙方關係的改善，自然對穩定基民黨政府的威望，有所助益。柯爾對東德貸款十億馬克事，以聯邦經濟部長藍斯道爾夫(Count Landsdorf)的話來說，是「金元換取希望」，柯爾希望東德在獲得貸款之後，能夠對西德做出某些讓步。藍斯道爾夫又說，此例一開，以後西德如果希望東德在某些問題上讓步的話，恐怕仍得使用「金元」攻勢，才能收效。柯爾政府希望東德能夠讓步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東德的領導階層，在東德內部和華沙公約集團之間，甚至在莫斯科的天秤上，都能先佔有相當的重量。何內克在安德洛波夫當權後的地位，正好和這個情況符合，而西德貸出這筆等於四億美金的十億馬克巨款，也不致毫無回報。去

年夏天，柯爾訪問莫斯科之前，波昂政府宣佈這件史無前例的新聞，柯爾提供何內克這筆「獎金」，其目的即在爲何內克抵制蘇俄壓力，打氣，甚至在部署潘興二號飛彈問題上，自會減少東德暗中策動的一些無形干擾，證諸後來情勢發展，似相符合。

「信函外交」攻勢

美國決定在德國部署潘興二號飛彈及巡弋飛彈前夕，美俄關係陷於低潮，國際局勢顯現極端緊張，而兩個德國關係反而表現得十分熱絡。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日，東德報刊，包括消遣性的畫報和科技專業性的報紙在內，同時以頭版新聞刊載東德共黨頭目何內克致西德總理柯爾的一封信。據稱東德共黨政治局的委員們，從同年夏季開始，即對西德政黨領袖發動一連串的「信函外交」攻勢。根據西德報章雜誌的引述報導，東、西德間往返信函的總數達到近百封之多，何內克給柯爾這封信，無疑的是東德「信函外交」攻勢中的高峯。現在將這封信加以分析。

一、何內克致柯爾信函的內容可分爲六段：

第一，東德對西德輿情的了解，和轉達東德尋求途徑的觀點。

何內克首先表示，不久以前，他曾與西德的政黨領袖、經濟界具有影響力的人士，就目前不斷尖銳化的國際關係，交換過意見，雖然雙方存在許多不同的意見，但是對於歐洲和平和未來兩個德國間的關係，可能受到不利的影響，彼此都具有相當程度的共識。

第二，爲避免核子戰爭發生時所造成的災難，西德總理應該建設性地考慮蘇俄頭目安得洛波夫的新近限武建議。何內克說，爲了東德人民的利益，他傾向於理性的合作，願與西德共同努力緩和緊張的國際局勢。基於這個觀點，何內克要求柯爾在平等、相互安全原則下，全力促成日內瓦限武談判達成協議，以減少東、西雙方因部署核子飛彈所造成的劍拔弩張的局面。何內克認爲安德洛波夫新近發表的聲明，有助於維持東西雙方的軍事均勢。

第三，如果西德成爲美國的核子武器基地，以蘇俄爲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勢將採取相對的報復措施。

用限武談判來達成和平的旨趣，和西德接受美國部署具有搶先發射性質的核子武器一事，不能共容。如果西德成爲美國對付蘇俄和東德的核子武器火庫，那麼東德的盟國無法袖手旁觀，蘇俄及其盟國會考慮到東、西雙方的安全利益，對日內瓦限武談判已提出具體建議，由於美國僵硬的反應，致使談判一無進展。

第四，持續的緊張國際關係，不僅將帶給各有關國家的不幸災禍，也將凍結兩個德國間未來關係的發展，經過雙方多年來不斷努力所達成的成果，終將毀於一旦。

第五，東德對任何建議，都會為確保歐洲共同和平安全作建設性的考慮。

第六，德意志民族應該記取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教訓，在最後危機未到之前，先應設法打消歐洲核子武器的部署計劃，避免在德意志生存的空間裏，再度燃起戰火。限武與和平共存是歐洲各國的共同願望，而德意志民族更應該携手合作，促使這個願望早日實現。

二、「信函外交」攻勢的動機：

東德的「信函外交」，事實上是蘇俄策動的一個計劃，也是約東西德完全倒向美國懷抱的一種策略。安德洛波夫在一九八三年夏季西德聯邦國會休假以前，也曾分別致函五十名具有影響力的西德國會議員（大半為社民黨籍的議員），一方面表達蘇俄對日內瓦限武談判的立場，另一面攻訐美國的和談政策。

稍後，蘇俄和華沙公約國又發表所謂「布拉格宣言」，對西歐國家威脅恫嚇，要求共同抵制雷根總統的核武政策。因為這兩項策略都未能獲致預期的效果，蘇俄遂不得不利用東、西德間的微妙關係，以信函外交作另一方式的進攻。

東德早就自作打算，預為日內瓦限武談判失敗後兩個德國關係先做準備。其中的步驟之一，便是實施「邀訪外交」，不斷地邀請西德具有影響力的人士，前往東德訪問。可以說「邀訪外交」是東德自己主動的，而「信函外交」則是被動的。但蘇俄和東德在美俄日內瓦談判中，又有不可忽略的共同利益。

三、「信函外交」能否發揮實際影響：

西德的大眾傳播媒體，對何內克信函反應相當熱烈。西德境內的和平運動，在一九八三年秋季，不再單向操縱於左翼分子手中。教會和西德社會中的右翼，透過西德保守政府的運用，在整個和平運動中，也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何內克信函固然有助於和平運動的聲勢，但是也發生一些負面的效果。

西德總理柯爾在一九八三年十月廿五日答覆何內克的信函之前，也曾在兩次公開的場合裏，提到這封信（一次在聯邦議會，一次在接見美國日內瓦限武談判代表尼茲時）。柯爾於十一月二十八日接見東德駐波昂常任代表，表示兩個德國間新關係的一頁業已開啓，事實上東、西德間複雜的外交政策，却永遠受到兩強的某些牽制，身不由己。

冷戰中的溫暖地帶

柯爾於一九八二年十月出任西德第六任聯邦總理之初，美國人普遍相信，柯爾在追求對蘇俄集團的和解政策上，一定會比前任施密特政府立場堅決，將和美國亦步亦趨。施密特的作風在東西雙方關係中，被認為在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很自然地，

雷根政府轉而對柯爾寄予厚望。

美國人這個單方面的厚望，很快即告幻滅。

柯爾政府不僅繼續執行布蘭德和施密特的東向政策，而且表現得尤為積極。

一九八三年夏天，柯爾政府經由被華沙集團描繪為冷戰中的第一號敵人的史特勞斯居間奔走，慷慨地給予東德何內克政權十億馬克巨額貸款。同年前六個月，西德對東德的貿易額，比一九八二年同期增了百分之三十三，而東德由其他東歐國家進口的金額，則普遍銳減。柯爾並在默默中擴展對華沙公約各國商務關係，他並準備今年春天訪問匈牙利，而保加利亞也在期待波昂政府高階層人士蒞臨訪問。從這些情形看，柯爾的東向政策，可說已達到布蘭德一九七〇年代實行和解政策以來的高峯階段。

今（一九八四）年一月間，六名東德人逃往美國駐東柏林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在短短六十個小時中，即獲得東德當局同意遣送西柏林，如果目前兩個德國間關係不夠和諧，這是不可想像的事。蘇俄將在東德及捷克境內部署SS 20飛彈，對抗美國在西德部署潘興二號飛彈的事，東德共黨頭目何內克也極力把它的嚴重性加以淡化。在莫斯科的安德洛波夫葬禮中，何內克也曾對柯爾強調，東德願在實際問題上，加強兩個德國間的合作。

這些出乎西方國家意料之外情況發生的背景是：柯爾一方面要堵塞國內部份人士對其贊成部署潘興二號飛彈的責難，同時也要解除面對反對黨民社黨改變兩黨傳統國防政策一致的壓力，祇有繼續推行東向政策及緩和兩個德國間關係，才能糾正被輿論和民社黨所塑造的形象。

對東德來講，經濟考慮佔第一位。繼續維持目前和西德的商務關係、貸款關係、金融轉移關係，以及因西德人民前往東德觀光、訪友、探親獲得的大量收益，對東德都較過去任何時期更為需要，東德自不願兩個德國間的關係倒退。

儘管波昂和華盛頓在某些方面如東西雙方貿易問題、北約組織責任分擔問題、提高國防預算問題，以及限制若干科技轉移轉蘇俄問題等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柯爾和雷根政府在對蘇俄企圖阻撓在歐洲部署飛彈問題上，意見始終一致。

德國是前線國家，正如西德外長根舍今年一月十九日在斯德哥爾摩歐洲安全合作會議上所說的：「德國位於歐洲心臟地帶，處身在西東兩個世界的分界點上，對於國際上任何對抗和不安可能帶來的危險，感受特深，德國人因歐洲分裂而導致自己國家分裂所承受的痛苦，也非常沉重」。

如果歐洲發生戰爭，不管是傳統戰爭或是核戰，德國都將是首當其衝的第一線國家。目前兩個德國在國際局勢極端緊張、兩個超級強國仇視對立的情況下，暫時擱置幾個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和諧相處，同時還不斷呼籲蘇俄儘速回到日內瓦限武談判的桌上，這固然是美、俄現階段政策情勢下某種有限度的「容忍」和「放任」現象，但從地理上和心態上加以深一層分析，就可了解今天兩個德國能在國際冷戰中，成為短暫的「溫暖地帶」，也是合乎邏輯的。

參考書錄..

- ① *Modern Germany*, by V. R. Berghahn.
 ② *The Germans*, by Gordon A. Graig.

其他參考資料..

- ① "Le DDR vend à l'ouest ses détenus politiques: Le prix de la liberté 23,000 FF par tête." Jean Paul Picaper, le 16 janvier 1982, *Le Figaro, Paris*.
- ② "Germans in East raise hopes over Strauss visi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23 July, 1983.
- ③ "Realpolitik on both sides as Honecker greets Strauss in East Berlin." Jürgen Offenbach, *Stuttgarter Nachrichten*, 26 July, 1983.
- ④ 「東德新社會主義德國十日」，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十八日臺灣（中國時報）。
- ⑤ "Concessions that the soft line might achieve." Joachim Nowrocki, *Die Zeit*, 22 July, 1983.
- ⑥ "East Berlin Shows a new image of self assurance." Peter Seidnitz, *Der Tagesspiegel*, 30 July, 1983.
- ⑦ 提供何內克「獎金」以反抗蘇俄壓力，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臺灣（國際日報）。
- ⑧ "Strauss... Nein, Danke." *Der Tagesspiegel*, 26 July 1983.
- ⑨ "Eine GESCHÖNTE Bilanz." *Der Tagesspiegel*, 28 July 1983.
- ⑩ "Kohl gambles." *The Economist*, August 26, 1983.
- ⑪ "All guilt on the East German front? No." *The Economist*, October 8, 1983.
- ⑫ "After the West German demonstrators have gone home." *The Economist*, October 22, 1983.
- ⑬ "The cost of democracy." *The Economist*, Oct. 22, 1983.
- ⑭ "The siren voice of Willy Brandt." *The Economist*, Nov. 19, 1983.
- ⑮ "Allemagne: Le Rêve et la réalité." *Le Point*, No. 589-janvier 2, 1984.
- ⑯ "West Germany must look eastward." Kim R. Holmes, *Los Angeles Times*, Dec. 18, 1983.
- ⑰ "Yes to deployment and to further negotiations." *Bonn Bulletin*, 20 Dec. 1983.
- ⑱ "West Germany's quarrel over a 35-hour week catches fire." *The Economist*, Feb. 11, 1984.
- ⑲ "Two Europes bridge the gap." R. G. Livingston,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 16, 1984.
- ⑳ "German-German ties: warm spot in a cold war" Joachim Worthmann, *Stuttgarter Zeitung*, 20 Dec. 1983
- ㉑ "Kohl seeks to maintain good ties with East Bloc nations." Thomas Meyer, *Kolner Stadt-Anzeiger*, 7 Jan. 1984.
- ㉒ "East Berlin lets Embassy fugitives cross to West." Hans-Werner Einecke, *Hamburger Abendblatt*, 23 Jan. 1984.
- ㉓ "Kohl's Ostpolitik takes on a new profile." Rudolph Bernhard, *Stuttgarter Nachrichten*, 26 Jan. 1984.

- ⑳ “Andropov’s unfulfilled mission” Berni Conrad, *Die Welt*, 11 Feb. 1984.
- ㉑ 「穿過『改寫歷史』的迷霧」，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十七日臺北〔中國時報〕。
- ㉒ “Bonn shares Honecker’s wish for good relations in 1984.” *The Week in Germany*, Jan. 6 1984.
- ㉓ “Speech by Hans-Dietrich Genscher on January 19, in Stockholm.” *Statements and Speeches*, Jan. 20, 1984.
- ㉔ “East Berlin gives short shift to one-Germany resolutio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13 Feb. 1984.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

本書第一、二、三冊，按時序先後編纂，紀述共黨自建黨至抗戰勝利之禍國罪行。第四冊起，改按專題編纂為「農村變亂（一）—查田運動」，第五冊為「農村變亂（二）—蘇維埃暴力分地」，第六冊為「農村變亂（三）—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與武裝叛亂時期的清算鬪爭等」。

十六開本 六巨冊

工本費 新臺幣 一千六百八十元
美金 四十七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臺幣五十元
國外：平寄美金 十五元
航空美金 六十五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限閱資料憑機關學校公函購用。